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

汪　晖

"鲁学"犹如一座肃穆的"古堡"，它以自身的辉煌历史和稳固的内部结构，屹立于急剧变化、纷纭复杂的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原野。回想一下一九八一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盛况，回想一下一九八五年王富仁博士论文提纲发表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人们不免感叹"鲁迅研究"现状的寂寞与冷落。有人不无揄揶地把"鲁学"说成是"古典研究"，因为尽管认真而严肃的研究者不断地为这个"古堡"添砖加瓦，并激烈而执拗地争论着它的内部结构的合理性（如"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问题），但这一切都并不包含着它曾经拥有的那种对未来与当代的自觉认识与判断，因而它无法参与当代思想与文化的最重要潮流。"鲁学"内部的分歧与辩驳由于不再构成与当代生活的对话关系，从而无情地被抛入"古典的"范畴。几年以前信心百倍地提出并得到广泛回应的"建立鲁迅学"的呼号，现在已淹没在各种名实未必相符的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之中。

"鲁学"似乎从"中兴"走到了"末路"。

抱怨，叹息。既无可奈何又无济于事。耐人寻味的倒是，鲁迅这样一位丰富复杂、植根于中国历史与社会生活的巨人，为什么在"鲁学"中却失去了与当代生活一系列问题进行对话的能力？在我看来，"鲁学"的危机是和"鲁学"过去的辉煌的历史相联系的，"失落感"应当引起我们对历史的沉思，对自身矛盾的反省。这种沉思与反省并不是为了恢复"鲁学"的"显学"地位，因为相对的宁静也许正适合于建立鲁迅研究的现代学术品格，更有利于研究者独立地思考问题。

鲁迅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

独立地思考，这是现代思想和精神的最重要的特征。思考的独立性意味着思考者个体意识的觉醒，它怀疑存在着可以用来最终解释一切的唯一的、权威性的范畴。现代文化思潮的复杂性、矛盾性、多元性与旧秩序的统一性、稳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人们在稳定的情况下用统一的观念体系去解释一切对象，而现在，正如一位哲人说的，这种稳定性与统一性已不复存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或许是有史以来唯一能容忍持续不断的认知增长的社会。当代思想界的"混乱"、文学界的"逆现象"恰恰隐含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多元性的理解：既然是多元的，非统一的，人们就有理由充分地发挥自身独特的思考和情感体验，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从不同的方面分别地趋近探究对象　面对现代思想的多元品格，任何单一的、无所不包的解释性理论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它的梦幻性或宗教性，正如阿尔都塞说的，人们在这样一种权威性的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即他们的现实世界，而是他们与那些在意识形态中被表现的生存状况的"想象关系"。这种关于世界的梦幻只能阻碍我们按照现实去看待现实。

应当指出，在人类思想的发展中，一切统一的、大全的解释性理论或作为规范的意识形态体系，都必然地具有强制性，都必然地依附于宗教的或政治的权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独立的个体不再能自由地思想，他必须而且只能按照这种意识形态的既定规范去解释他所面对的任何事物，因而解释的结论必然是先定的，是对权威意识形态的既成观念的论证。思想，这个只能遨游于自由的宇宙的鹰，在一统观念的笼罩下失去了自由和独立性。它除了默默叹息还能做些什么呢？

对新时期鲁迅研究局限性的思考，把我们引向了更早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并不遥远，但对生活于当今时代，并把多元性、独立性视为当然价值尺度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相隔整整一个世纪。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的时期，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权威的时期，同时也是为建立和巩固新的生产关系而自觉建构相应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时期。鲁迅研究的最重要的历史传统与基本构架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那时，鲁迅形象是被中国政治革命领袖作为这个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权威而建立起来的，从基本的方面说，那以后鲁迅研究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完善和丰富这一"新文化"权威的形象，其结果是政治权威对于相应的意识形态权威的要求成为鲁迅研究的最高结论，鲁迅研究本身，不管它的研究者自觉与否，同时也就具有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应当正视的是，新时期鲁迅研究正是在这个坚固的历史前提下展开的，鲁迅研究被认定"不仅关系到对鲁迅本人的学识和贡献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以及对中国革命史的评价，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未来的前进道路"，"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科学评价是经典性的论述，它曾经指导我们的鲁迅研究工作循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和日益深化，今后仍然是我们从事鲁迅研究的指针"。① 正由于此，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机构和它的各级地方组织都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了纪念鲁迅一百周年诞辰的学术活动；鲁迅研究肩负着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规范的沉重任务。

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和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②，即把鲁迅作为现代革命历史的"至圣先师"。"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政治领袖对"鲁迅精神"的理解③，这种理解一方面联系着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形势，即把鲁迅视为党的鲁迅、民族的鲁迅，另一方面又是作为普泛性的意识形态要求而不是独特的精神品格出现的。后一方面越到后来越加明显：鲁迅研究承载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命，决定了鲁迅研究者对鲁迅精神理解上的分歧必然也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意识形态的特点在于，它总是使人自觉自愿地服从于某种至上权威，正如封建时代的人们对于"礼"的主观自觉地服膺。人的思想自由在意识形态的范畴内是被自觉、自愿、自由地奉献于一个更高的圣坛。因此，在政治意识形态制约下的鲁迅研究的一些更具学术性的现象就更加耐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寻味：

第一，一些对鲁迅精神有着深刻体验与理解的研究者，对于鲁迅精神中那些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不相吻合的独特而复杂的现象，自觉不自觉地忽略和持否定态度。他们通过与鲁迅的交往或阅读鲁迅著作而形成的感性经验，同他们先定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存在着冲突，却总是用后者支配前者。例如，冯雪峰同志是一位对鲁迅有着很深理解的前辈，他直觉地感到那些指责鲁迅“悲观”、“虚无”的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理解鲁迅“正视黑暗”和执着现实的精神，但先验的判断却使他没有循此而去研究鲁迅精神的这种复杂现象及其意义，而是断言鲁迅对于“黄金世界”的否定是“没有经过深思”、“脱口而出的话罢了”，“跟他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时的向前发展的要求，是显然不相符的……”④ 在这里，孤独、寂寞以至悲观、绝望等在鲁迅精神中具有独特含义的思想范畴，就被作了先定的价值否定，于是，《野草》《彷徨》等作品的思想价值也就不可能得到深入的发掘。

第二，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无所不包的解释性理论，构成了鲁迅研究基本的分析和评价的工具和尺度。由此产生了两个结果：首先，鲁迅研究的基本构架是由这个先定的意识形态构架为基准，而不是由鲁迅自身的精神结构为基准；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系列重大命题和思维逻辑，在鲁迅研究中构成了一种不是从鲁迅本体出发的、先验的体系，它的概念系统及其运思方式也就不免偏离了鲁迅独特的思想和情感形态，偏离了鲁迅思考问题的特殊角度。例如，根据陈涌同志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呐喊》、《彷徨》无非是以形象的方式表述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一系列命题，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致命弱点问题，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农民的政治反抗问题，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妇女问题，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软弱性、动摇性和妥协性问题，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脆弱性问题，……由这样一些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建构起来的鲁迅小说的阐释体系必然也就具有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模式对自身矛盾的解释方式更清楚地证明了它的结论的先验性质：前期鲁迅被界定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他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文学却包含了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才能提出的基本命题。对这种内在的逻辑矛盾的解释完全依存于对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的论证：“虽然鲁迅当时对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思想还不理解，但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到，鲁迅实际上是把五四的根本方向，为共产主义思想所决定的方向，作为自己的指导方向，并且对这方面表现着这样信任，这样坚决，这就表明，中国杰出的和优秀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可能而且在中国的条件下必然把自己的活动逐渐溶合到共产主义思想中去。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规律。即使鲁迅在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在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前，还需要经过一段复杂曲折的路道，经过一个摸索和怀疑的过程，但这个根本方向，是在鲁迅进入中国文学生活的第一天，便确定了的。”⑤ 我们现在还来不及讨论这种典型的决定论的思想方式，它在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中也仍以不同的面貌或隐或现；这里首先涉及的还是鲁迅研究的意识形态构架产生的第二个直接后果：鲁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某种先定的“神圣”或“绝对”的论证，从而斩断了鲁迅精神与生活的那种深刻的批判性联系。

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把鲁迅的生活道路和精神历程简化为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根本方向”和“根本规律”，也即意味着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鲁迅研究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对[illegible]神圣的、绝对的"方向"和"规律"的论证。鲁迅——这个不想论证任何东西的永恒性，却不懈地揭示现实存在的短暂性的人——恰恰成了某种"绝对"和"神圣"。由于害怕伴随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现实而产生新的变革内容，害怕鲁迅的那种顽强执着的批判和否定精神揭示出当代生活的暂时性和局限性，并成为鼓舞变革这种局限性的一个力量源泉，鲁迅的那种批判性的、否定性的文体被宣布为不适合于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过时的东西，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作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文学论证或"镜子"是"清醒的"、"彻底的"，但它属于历史，属于过去，属于对旧时代的批判性总结；它们不再是生活力量本身，不再是一种不朽的革命性变革的力量；人们不是在世界的变动之中，在冲突的焦点之中，来解释那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一种历史力量的东西。鲁迅研究在两个方面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由于我们不是通过对鲁迅批判精神的认识来达到对自身的批判，不是从鲁迅那里发现当代生活与鲁迅所批判否定的生活之间的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斩断的联系，因而我们也就失去了对鲁迅精神的现实性理解；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不是从广泛的世界性联系和具体的生活过程中研究鲁迅全部精神结构和它的运动过程，研究鲁迅复杂的文化心理及其对生活的回应，而仅仅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指导下研究鲁迅对他的直接目标的批判，研究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限，这样我们也就失去了活生生的、丰富复杂的研究本体。在这些研究中，鲁迅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似乎便走入了"神圣"和"绝对"，便不再有对自身，自身所属阵营，以至自身接受了的新思想的认识、批判和否定(也即发展)，因为我们对于"神圣"和"绝对"绝对说不出什么东西来；在这些研究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鲁迅对我们和我们的时代的"认同"——因为我们和我们的时代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因此，第三，在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构架内，鲁迅的形象被"圣化"了。我不使用"神化"而使用"圣化"一词，是由于在鲁迅研究的泛政治模式中，鲁迅并不是作为一个救世主、一个与生俱来的英雄来描述的(那是帝王的形象而不是圣贤的形象)，相反，人们仍然可以批评他的前期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被"圣化"的首先是他那"民主主义——共产主义"道路，而后才是这个作为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权威形象的"圣化"。应该说明的是，"圣化"不是指对鲁迅及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评价，而是指按照权威的意识形态需要来塑造鲁迅；鲁迅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化的巨人，他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确是他的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他对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洞悉与描绘使他的著作成为了解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经典。区分对鲁迅的高度的历史评价与"圣化鲁迅"无疑是必要的，尤其当有人在逆反心理支配下贬抑鲁迅的时候。事实上，"圣化"鲁迅不过是"圣化"那些与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相适应的东西，真正被"圣化"的与其说是鲁迅不如说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或实际的社会政治需要。总的说来，"圣化鲁迅"的结果有下述三个方面的表现：一，一切与这种权威意识形态需要不相适应的存在，无论其多么明显与重要，不是被抹杀，就是被歪曲。例如，鲁迅与二十世纪现代文化思潮的精神联系，由于这一意识形态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全面的价值否定，成为鲁迅研究的禁区；鲁迅对施蒂纳、尼采、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人的深刻共鸣只是在"误解"的范畴内偶而涉及，而鲁迅与高尔基等联系并不紧密的作家的关系，却得到显著的渲染。鲁迅精神和创作中的某些与意识形态需要不相吻合的部分，如《野草》所表达的种种情绪不是被完全无视，就是作价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值上的否定；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尤其是鲁迅对群众精神病态的批判，由于不合意识形态对群众的基本评价尺度，或者被说成是前期鲁迅的局限性、或者被简单地“忽略”；相反，诸如“听将令”之类的说法则得到显著的渲染和发挥。……二，在政治需要的前提下，反复征引鲁迅在特定条件下的某些思想和用语，他的言论被剥离开他的整个精神结构而作为抽象的准则，并实用主义地加以应用。这一点众所周知，记忆犹新，似已无需举例说明。三，“至圣先师”的意识形态品格，要求他成为一个偶象式人物，他的一切爱、恨、生、死、喜、哀等人的情感必须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于是，鲁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独特个体消失在历史的天际，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仅仅是“民族英雄”的鲁迅、“阶级斗士”的鲁迅、“党的”或“党派的”鲁迅；除了阶级的民族的和党派的情感和思想而外，鲁迅不再有其它情感与思想。

鲁迅的“圣化”或偶象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对此作任何一种简单化的理解都将得出片面的结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包含了这位政治领袖对鲁迅的不乏深刻的洞见与理解，鲁迅自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是他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讨论鲁迅的“圣化”问题并不意味着对毛泽东及其后的研究者的具体论断的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无视鲁迅的伟大与深刻。问题在于，鲁迅的“圣化”渊源于某种深远的民族文化心理，渊源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用鲁迅来替代他和他的同道打碎了的“至圣先师”的偶象，这本身就是对鲁迅和他的思想艺术的历史性讽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把意识形态与形而上学相提并论，他认为形而上学同伦理道德（亦指意识形态的其它形式）一样没有历史。[8] 没有历史也即意味着永恒，即它无所不在、以其永不改变的形式贯穿于变迁的历史之中。永恒性意味着思想的停滞，因为思想总是在对不断变迁的现实作出回应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变化的，独特的，溶合着人们的独特的经验，因而思想不可能是永恒的，其中总是包含着某种局限。当人们不是从独特的生命体验，不是从变迁的历史中来理解鲁迅，而是从普遍的、永恒的意识形态来理解鲁迅，独立思考的权利就被剥夺了。不同个体笔下的鲁迅形象本应形成不同的、体现研究者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的鲁迅形象，而在意识形态的覆盖之下，无论研究者们有怎样的分歧和争论，鲁迅的形象只能是单一的，绝对的，抽象的，甚至那些用来体现鲁迅的“人”的特点的东西，在这个形象身上也是苍白而缺乏活生生的个性的。

我不得不向那些严肃的研究者们致歉，他们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为鲁迅研究做了大量的、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贡献。当我对鲁迅研究作一种历史性批判的时候，我无法一一叙述在鲁迅研究的历史前提发生了根本性问题的时候，他们对许多具体问题所作的分析和考证实际上为我们今天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如果重大的历史前提在发展的进程中丧失了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切隶属于、依存于这一历史前提的分析与判断，在总体的意义上，必然呈现出自身的片面性和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先定的前提与回到鲁迅本体

对历史现象或文本的理解本来就不是一个方法问题，它涉及的是人或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正如伽达默尔说过的，理解活动是人存在的基本模式，而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意识的活动，那种狭义的文本理解和解释活动只是从这种本体论的理解活动中派生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鲁迅研究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突破主要地不是由于解释方法的更新，如心理学、系统论等等的运用，而是由于我们对世界、现实和自身传统的全部经验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局限性正来自于这种经验变化的限度。

思想解放意味着对旧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反叛。但是，在思想领域中，“反叛”不可能不是一个漫长而充满痛苦与矛盾的过程。既然人们无法在历史与传统之外，只能在历史与传统之内来理解历史现象，那么，无论这种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反叛”了自身的传统，我们也仍然可以发现这种“反叛”行为与自身的“反叛”对象之间的那种内在的微妙关系。鲁迅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联系必然地使它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初期处于活跃状态，因为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意味着对旧的意识形态权威的怀疑、困惑与反叛；同时，鲁迅本人无论在身前还是身后，都曾与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的、需要重新审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生联系，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领域里。粉碎“四人帮”以后，围绕着“两个口号”的论争、“左联”问题，瞿秋白、胡风和冯雪峰的平反，“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再评价，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如胡适、陈西滢、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重新认识……鲁迅一再地成为人们议论和研究的中心。应当提醒人们注意的是，鲁迅在这种场合之引人注目，仍然是和特定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相联系的。因此，一系列具体判断的变迁与思维模式的内在延续构成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重要特点：对传统的挑战与对传统的承袭使我看到了鲁迅研究者以至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刻的精神冲突。

意识形态用一种关于现实关系的想象性畸变来把握世界。由于总是和现实的权威力量，如政治和宗教相联系，它的一系列命题和判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可论证、也无需论证的真理。以这样一种先定的前提和判断作为立论基础的研究，无论其结论的现实尖锐性如何，都必将在科学精神与思辨理性的门前止步，都意味着研究者思维独立性的最终丧失。

不幸的是，新时期鲁迅研究在突破原有的对鲁迅的理解与评价的同时，仍然承续了一系列未加论证即作为前提使用的命题、概念和价值判断。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在一些重大的、具有某种突破意义的成果中，我们仍然发现了那种简单的决定论思维模式。其根本的特点是就它的先验性，它的概念与尺度的绝对权威性，它的概念系统与鲁迅自身的思想内容的分离性。这一切发生在人们试图与旧有的鲁迅研究的泛政治意识形态模式告别的过程中，发生在解放思想、建立新的、具有科学意义的“鲁迅学”的过程中，发生在人们的理性启蒙与自觉的时期，格外令人深思。我从下述几个不同的方面对此作扼要的分析：

第一，眼界的拓展与结论的先定。

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功绩之一，就是使许多过去视为禁区的领域重新开放，过去“为贤者讳”的显著事实成为人们进行研究、取得突破的对象。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一些重要进展突出地体现在关于鲁迅与外来文化的历史联系和比较的研究之中。鲁迅与俄罗斯古典文学，尤其是鲁迅与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在传统意识形态意义上被称为“反动作家”的关系获得了广泛的重视，而鲁迅与尼采这一复杂而敏感的课题一次次成为人们讨论的对象。鲁迅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巨人，而成为世界性联系中的巨人。但是，在这类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先定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涉及的是鲁迅与“反动”作家的关系，其立论的方式是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为什么会接受诸如尼采这样的“反动”思想家的思维成果？因此，尽管人们承认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承继关系，但论述的终点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始终是辩解性的，即把所谓“本质的区别”作为研究的最高结果。这类文章的基本思维逻辑就是：“历史的误解”——“特定条件下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本质性的区别”——“最终的抛弃”。承认鲁迅与尼采的历史性联系，承认这种历史性联系包含着某种积极意义，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把这种历史性联系纳入鲁迅自身的思想过程与现实需要，从而分析二者的区别，这在理论上也不无道理。问题在于：全部立论建立在对两位思想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判断之上，因此，人们并没有去细致地分析尼采思想的实际内涵，没有以二十世纪现代文化思潮这一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去透视尼采的多方面的、极其深远的意义，从而也就只能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以中国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为唯一参照，以意识形态判断为唯一尺度，对鲁迅接受尼采学说这一事实作出解释。这种研究部分地揭示了所谓“历史性的误解”的内涵，却没有展示出尼采思想在现代文化中产生如此广泛深远影响的深因，从而也就未能理解鲁迅与现代文化的精神联系。正是由于人们实际上仅仅是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阐述问题，因而，后期鲁迅对于尼采的为数不多的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批评也就被理解为鲁迅对尼采的最终抛弃，而尼采的思维方式、精神气质以及渗透着尼采思想的现代西方文化对鲁迅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则完全不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关于鲁迅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尤其是鲁迅与安德列耶夫，《野草》与象征主义之类的研究论题中。“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在一些文章中只是作为个别作品的偶然的或个别的现象，而不是把它放在鲁迅整体精神结构和艺术体系中考察；《野草》的象征主义也常常只是被限定在艺术方法的范畴内考察，而不是把它放在二十世纪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广阔背景中来理解。结构主义认为，真正理解现象的唯一方式是把它们与更大的结构联系起来，事实上，理解一词本身就涉及到事物与结构的关系。然而，当人们首先用政治性判断对研究论题作了限定之后，研究也就必然被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因为超越政治意识的层面，上述的先定前提就必然遭到挑战。正是由于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这样一个相对恒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判断，许多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判断的复杂现象就成了这种单一判断的牺牲品。例如在一篇总体相当不错的论文中，作者在分析《野草·复仇（其二）》所描写的“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时，完全脱离开作品的独特的表现方式和这种象征性描写所隐含的深刻而复杂的精神现象，断言“这种‘复仇’，显然并不能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旁观者既不能因此而觉悟，复仇者也给自己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在客观上反而增添了自己的寂寞感。”⑦孤独、寂寞、绝望、复仇——这类具有深刻心理内含，又与现代文化思潮有着内在联系的精神现象，在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参照之下只能成为一种不必多加探究的否定性的精神现象。

第二个先定结论则表现在时代性与民族性问题上，其特点是就把时代与民族的政治生活状态作为评判文学的尺度。在比较鲁迅与契诃夫、果戈理、托尔斯泰或其它文学家的过程中，人们实际上是按照时代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把鲁迅的思想和艺术凌驾于后者之上，其内在的尺度则是“革命民主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对于“民主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政治先进性。王富仁在回顾自己关于鲁迅与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研究时说的极中肯：“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对，但这种观念本身却是极其有害的。文学最不能放在机械论的范围中来研究，它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领域，假若我们简单地把鲁迅置于果戈理之上，我们也就可以把赵树理置于鲁迅之上。”⑧应当指出，这种机械论与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教条主义倾向和特定的权威意识形态的先定判断相联系。研究的最高结论是先定的，研究过程与研究目的并不意在发现新的东西，而只是用研究对象证实已有理论认识的正确性。与此相类似的问题，就是在分析鲁迅的文学作品时，不是从作品出发，而是根据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性质(政治意义上的社会性质)，并用革命民主主义所涵盖的鲁迅思想(在这里，作为政治哲学概念的革命民主主义同鲁迅思想划上了等号)来解剖人物以至艺术过程。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将谈到。

先定的前提假设对于研究者来说经常是不自觉的，在先定的前提假定没有得到自觉的清算之前，任何具体的突破的意义都是有限的。然而，一切革命性的思维都是在局部的变革中蕴育成熟的。因此，当我们阅读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文章时，这些文章呈现的内在矛盾恰恰显示了思维的拓展。林兴宅、吕俊华同志尝试用系统论、哲学和心理学方法阐释《阿Q正传》，今天看来这些研究仍然显得生硬，虽然他们对阿Q现象的阐释增加了新的观照角度而显得丰富复杂，但在总的方面并没有突破原有结论的基本框架（这可能与论题的有限性有关）。然而，这种尝试确实使人们对一系列先定前提产生疑问，当人们意识到"阶级论"不能解释阿Q精神的一切方面时，合乎逻辑的思考将是：旧有的理论体系及其概念和命题能够完整地解释鲁迅吗？

第二，思维的深化与概念的贫乏。

当人们从旧的思想桎梏中摆脱出来的时候，终于获得了对鲁迅思想的独特性的认识。人们力图从鲁迅认识问题的特殊角度来总结鲁迅的独特思想。然而，在相当多的文章里，人们实际上仍然用一些普泛性的概念，如革命民主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进化论的历史观、阶级论……对鲁迅思想作一种所谓"本质性的"或"规律性"的界定，而这种"本质"与"规律"实际上仍然依存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总结。这里涉及的是规律与普遍的解释语言的问题。西方十七世纪哲学和科学的中心主题是寻找解释世界的普遍语言。人们通过对各个领域复杂事物的分解与界定，筛选和抽象出一些最基本的单元，然后按照统一的逻辑组合方式，构成起支配作用的根本规律。然而，例如按照普里高津的看法，今天应当彻底放弃这种把世界的全部复杂过程归结为几条基本规律的方法，人们应当寻找新的多样性的解释语言，寻找解释不同现象的特殊语言。⑨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关于世界的论述，另一个层面则是关于世界的论述的论述。鲁迅研究无疑隶属第二个层面，因此它必须重视对于鲁迅独特的语言概念的阐释。按照现代分析哲学的观点，"关于世界"与"关于语言"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世界就是人们描绘的那个世界，那个在特定的概念体系中存在的世界。考察鲁迅的意象和概念中的世界，也就是在考察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研究实际上就是要研究他所感受到的世界结构，这个世界结构由于不同于别的思想艺术体系中的世界结构而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因此分析鲁迅的思想，分析鲁迅理解和接受这个世界并互相交流的概念的最好方法，就是研究它们在鲁迅自身世界中的实际应用。然而，即使是在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中，人们也习惯于沿用普泛性的政治哲学概念来研究鲁迅的思想和文学，而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未加论证。概念的贫困在这里是和那种顽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模式相联系的。

用普泛性概念无法揭示鲁迅思想和艺术的独特性，这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说明：

首先，民主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哲学概念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对西方社会历史现象的总结，并有着相对稳定的内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涵。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这些概念分析中国社会和历史现象时，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亚细亚生产方式意味着与西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差异。承认这种差异也就必然要承认人们必须用不同的概念体系或对现有概念体系加以注释性的改造来把握对象。东方专制的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礼教)与西方专制社会的区别，也就决定了东方革命者的革命对象与西方民主主义者的区别。正如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内涵与法国民主主义革命者在深刻的联系中又有着深刻的差异一样，中国现代革命的性质和它的思想体系必然也有别于西方与俄国的革命性质和它的思想体系。因此，用“革命民主主义”以至于“反封建”等术语尽管可以揭示鲁迅社会政治意识的某些方面，却没有呈现鲁迅思想的独特性，也没有呈现中国革命之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就鲁迅而言，他不仅早年发表过大量反民主的言论，而且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时期，仍然对民主政体的基本形式议院持否定态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鲁迅并没有从政治哲学和社会体制的意义上谈论民主问题。因此，西方有些研究者按照他们对“民主主义”的理解而断言鲁迅是“反民主”的思想者。同样，“封建主义”这个概念也不是鲁迅的概念，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礼教“吃人”以及两种“奴隶时代”……等等提法与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反对封建主义”显然有所区别。如果我们不是对鲁迅自身的概念体系以及这些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特殊性加以考察而是直接套用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来说明鲁迅思想及其社会意义，必然出现概念系统与鲁迅思想内涵的分离性。

其次，在鲁迅研究中习用的大量术语常常既不是在鲁迅自己使用的意义上运用，也未得到科学的界定。例如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概念，在一些文章中未加论证即投入使用，这两个隶属于同一体系的概念又经常作为对立的或矛盾的双方用以描述鲁迅思想，仿佛“个性”问题并非“人道”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有同志对此作了相当细致的分析、界定，但鲁学界仍然普遍地用这些不加论证的术语说明鲁迅。“鲁迅是一位人道主义者”的命题被广泛接受，然而鲁迅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却没有得到深刻的理论分析，这一事实是和术语的科学性相关的。事实上，正如革命民主主义概念对于鲁迅研究而言曾是无需加以论证的先定前提一样，对许多人来说，人道主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也是人们的旗帜——一种无需加以论证的先定前提。一九八六年十月，在“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法国学者米歇尔·鲁阿曾就《鲁迅是“人道主义者”吗》为题，首先对作为理论的“人道主义”与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加以区分，认为在前者的意义上，鲁迅是站在反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的，而在后者的意义上，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鲁阿的分析借助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其科学性是可以讨论的；然而她对概念的分析方式却值得我们注意。遗憾的是，人们对习用的概念并不愿意多加思考。象进化论、国民性等鲁迅经常使用的、具有独特内涵的概念也经常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有的同志把国民性与阶级性作为对立范畴，也有人是用斯大林关于民族性的概念比附国民性概念。概念，是进行科学思维的工具，概念模糊必然导致思维的混乱，而当概念成为论证的先验前提时，结论的全部可靠性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鲁迅作为一位文学家，而不是营造严格体系的哲学家，他的思想表达方式经常是相当感性的，例如在《野草》的人生哲学体系中，他的一系列思想范畴是通过大量反复出现的意象呈现出来的，象“一切”与“无所有”，“希望”与“绝望”，“沉默”与“开口”，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生”与“死”，“天上”与“深渊”，“人”与“神”，“人”与“兽”。“地狱”、“天堂”与“黄金世界”，“停下”与“走”……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的：每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已经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观念、意象；正是在这些观念、意象里，凝聚着作家对于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表现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3]。当人们不是从这些独特意象的观察而是从一系列先定的、甚至未加论证的前提和概念来阐释鲁迅时，这个阐释体系的先验性质就是显而易见的事了。

第三，“回到鲁迅那里去”与决定论的思维模式。

只有当我们彻底地意识到我们的每一个观点和术语的限定性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建立科学的阐释体系。然而，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的，意识形态自身适应于现实，对于站立在意识形态中的人来说，它的那些纲领性的信条似乎是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 因此，意识形态不可能具有那种包含了对自身的彻底的批判性。当人们没有从前提上思考问题，而只是对旧有的某些结论产生怀疑的时候，人们也就只能用更加复杂的丰富的方式来论证这个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论证前提。新时期鲁迅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仍然停留在这样的阶段，那种把鲁迅视为“无所不包”的“圣典”的前提假定，使人们在相当细致、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科学”形式的状态下，从各个领域重新塑造那个被政治运动沾污了的形象。研究者不是在人格平等的状态下审视鲁迅，而是匍伏在巨人的脚下瞻仰他的理念的光环。鲁迅对民间文学的贡献，鲁迅的书法艺术，鲁迅的美学思想，总之，鲁迅在他曾涉及的一切领域都被加以“圣化”。鲁学的丰富化与它的批判性的丧失导致一些富于开创意义 并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意识形态批判内容的著述，在整体的构架上无法摆脱先验的理念化的思维模式。例如刘再复同志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包含了对专制时代的僵化的文艺思想的批判性思考，但思考的结果仍然是把鲁迅的美学思想描述成了无所不包的体系。正如陈燕谷、靳大成指出的，读《论稿》让人感到刘再复思想拐杖的陈旧、不合用，他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活的灵魂作为指导他研究的理论方法，而是借用或者说简直就是搬运现成的命题、公式和概念体系，以当时流行的观点为蓝本来分割鲁迅的有机的文艺观整体，把鲁迅的文艺美学思想写成了马列文艺思想的注释性的辅导材料。真、善、美的构架是作为一种先验理念而不是对象的原有结构出现的 刘再复对古今中外美学思想的有价值的考察，由于他的思维前提而只能成为论证这个前提的材料。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高度评价王富仁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的“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它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它力图否定鲁迅研究的先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前提，王富仁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胳的研究系统，是一个变了形的思想图式。王富仁力图“回到鲁迅”的原初意图，并以这种原初意图作为自己的的阐释基础。

然而“回到鲁迅那里去”的批判性是有限的，因为这一口号建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研究者在认识过程中可以完全离开自身的历史性或自己的历史“视界”而直接进入鲁迅的“视界”。这样，这一口号意味着可以用一个客观的系统取代另一个主观的系统，而一切阐释都应当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旧的意识形态的阐释系统就是在客观的、稳定的形式下分析鲁迅，它不承认自己的主观性与局限性，一切结论都具有终极真理的性质。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王富仁在批判旧体系的过程中直观地提出这一口号，却没有深思这个口号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保守性质。正是在王富仁最富于革命性的地方，我们发现他的思维模式没有得到真正的革命性的改造。

王富仁的局限性不在于他的具体结论方面，因为任何一个结论都是从特定的角度作出的，从而它的适用范围，是不言而喻的事。王富仁的局限在于他的思维方法。我这里说的还不是他也是在未加科学分析的情况下直接沿用了旧体系的概念系统，从而在解析和逻辑推衍中必然会出现不精确以至武断的地方，我所说的思维方法的局限更主要地体现在他的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和由这种决定论方法建立起来的完整体系之中。

王富仁博士论文的庞大体系建立在双重因果决定关系上：时代的思想革命运动决定了作家的意识倾向，作家的意识倾向决定了作品的本体意义、意识本质、创作方法和艺术观念及技巧。在这个线性因果决定论的体系中，王富仁的逻辑推衍是颇为严密的。然而，面对这样一个严密的体系，我常常想起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批评："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他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1]在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思想革命"的命题是他论述的起点，又是他的论述终点，甚至连艺术方法及技巧都由这一命题支配，又反过来说明了这个命题。艺术创作的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涉及作家的意识和潜意识，涉及历史的总体状态和偶然的生活契机，涉及文化传统与艺术传统的渗透和个别艺术作品的启发……——在这里却成为"思想革命"这一"绝对理念"纵横捭阖的场所。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而那种毋庸置疑的线性因果逻辑的实际前提，却是将现实世界、作家精神结构和艺术创作过程的复杂性纳入一个单一的强制性联系之中。例如，他把鲁迅小说的创作方法——一对应于思想革命的意识需要，创作方法首先被界定为"对话方式"，而现实主义是被视为进行思想意识改造的有效手段而"必然"成为"第一需要"。不能不说，这种"必然性"是在大量条件被省略掉之后的"必然性"，它造成了一种错觉：作家的社会政治意识乃是艺术过程的唯一决定因素。于是，在王富仁的体系中，鲁迅对浪漫主义的弃取也完全决定于为思想意识改造而进行对话的有效性。

王富仁的体系中有一种对"必然"、"规律"和"本质"的偏好，这种思维方法把存在范畴和意识范畴的大量"现象"作为"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搁置一旁。象陈涌同志断言鲁迅的全部道路在他进入中国文学的第一天就已决定了一样，王富仁相信鲁迅的创作过程在他形成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意识趋向时也已决定了。因此，他们需要寻找的就是这种决定性的规律。《镜子》一书的思维逻辑可以概括为：反封建思想革命是《呐喊》《彷徨》产生的历史时期的"本质"，鲁迅那时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最完整、最集中地（合于本质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本质需求，因而《呐喊》《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这种思维逻辑把鲁迅小说仅仅看作是中国现代社会的认识论映象，并且把描述限制在与思想革命相联系的有限的现实与思想的范围内。从论文的第二章"论《呐喊》《彷徨》的意识本质"可以看出，作者关注的仅仅是进化论、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等所谓"意识本质"，而作家的经验的、感性的、文化心理的层面则显然属于非"意识本质"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二十世纪对"偶然性"的发现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人类思想的重大发现，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作出了深刻分析，普里高津把规律、必然性视为偶然性汪洋大海中侥幸冒出的孤岛，尼采发现了人的主体意志作用，弗洛依德把人的潜意识看作是人类意识的创造力和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现代阐释学揭示了人类理解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认识过程，即不是在认识过程中呈现客体的"客观规律"，而是对象"视界"与研究者"视界"的"融合"过程，"事物本身"所呈现的东西将按理解者"变化的视界"和研究者向对象问的不同问题而不同……他们的理论仍然需要历史的检验，但他们对偶然领域的发现无疑丰富了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宣告了以探讨必然性为唯一任务的黑格尔式的决定论思想的重大缺陷。由于王富仁把"思想革命"视为"五四"的时代本质，从而在反映论的意义上，他也就把鲁迅思想意识中与"思想革命"的基本思想相关的部分视为"意识本质"，这样，他实际上不可能从整体上、结构上来理解鲁迅的精神体系，也不可能呈现鲁迅精神结构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例如，王富仁认为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体现了思想革命的根本规律，并进而分析进化论在鲁迅小说中的思想意义。然而，王富仁完全无视了鲁迅思想和体验中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无处不在的"循环感"、"重复感"或"轮回"的体验；历史的过程仿佛不过是一次次重复、一次次循环构成的，而现实——包括自身所从事的运动似乎并没有标示历史的"进化"或进步，倒是陷入了荒谬的轮回。就欧洲而言，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把西方历史看成是"偏至"过程，甚至断言后来的物质文明与民主政治较之先前的社会构成了对人的更严重的压抑；就中国而言，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到"刀"与"火"的相续，再到并无"王道"、"霸道"永存的判断，鲁迅总是在"似是而非"的历史中找到"古已有之"的"似非而是"。鲁迅抑制不住地将被压抑在记忆里的东西当作眼下体验来重复，而不是象人们通常希望的那样，把这些被压抑的东西作为过去的经历来回忆——支配着隐在心理的不是心理学中的"唯乐"原则或一般的重复原则，而是一种无法抹去的创伤感，一种总是被外表相异而实质相同的人与事所欺骗的感觉。这常常使鲁迅感到现实中出现的东西事实上不过是一段早已忘怀或永远不能忘怀的过去生活的反映，从而他不断地在自己的同时代人、朋友以至战斗伙伴的身上发现"过去"并未过去——无论在意识的、理性的层面，还是在潜意识的、感性的层面，鲁迅精神中都存在着一种反进化论的思维逻辑和情感趋向，并且构成鲁迅"看透造化把戏"的重要的尺度和结论。那么，这种反进化论的思维逻辑与进化论的思维逻辑在鲁迅的思想和艺术中又处于怎样的悖论式的或矛盾的关系呢？王富仁的"意识本质说"没有回答。又如，王富仁始终是在理性启蒙主义的层面描述鲁迅思想和小说的意义，因而他把"人道主义"、"个性主义"视为"意识本质"；然而，如所周知，鲁迅的精神发展过程深受施蒂纳、叔本华、尼采、基尔凯廓尔、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厨川白村等人的影响，这些引导二十世纪现代潮流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非理性主义思想体系恰恰是和理性启蒙主义理想的破灭相联系的，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及其人道主义思想显然无法涵括他们的思想遗产，那么，这些非理性主义思想遗产与理性启蒙主义在鲁迅的精神结构中、在鲁迅的艺术世界中关系又如何呢？王富仁的"意识本质说"同样没有回答。

问题在哪儿呢？我认为，问题就在于那种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就在于王富仁对于所谓"本质"的先定判断，就在于"镜子"模式的单一参照系：从陈涌到王富仁，他们的小说研究无意于探讨鲁迅与现代文化思潮的复杂联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系，无意于探讨鲁迅的文化心理在艺术中的呈现，因为这一切都在们他所理解的现代历史的“本质规律”之外。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王富仁与他的批判对象之间的思维模式上的内在联系。围绕着王富仁博士论文而引起的一次次争议恰恰证明了这种联系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论争经常不是来自对鲁迅精神的基本理解，而是来自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概括正确，还是王富仁的概括更切实际？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刘再复、王富仁的体系包括了以前的研究成果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发现至今仍给人启发的丰富思想。“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只要人们不是停留在“体系”面前喋喋不休而是深入其中探寻革命性的思想，那么就必然超越“体系”的局限。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主体性理论”就是从他对鲁迅美学思想的理解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他的《鲁迅成功的时代原因与个人原因》等文也显示了他对鲁迅的理解的深化。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极其肤浅的鲁迅小说研究就是在王富仁的启发之下进行的，不仅他对旧的研究体系的批判性概括使我洞察了过去，不仅他的革命性的口号和强大的理论气势给我以震撼，不仅他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对鲁迅小说的至今价值未减的分析给我以启发，而且甚至是他的“体系”的局限性也使我思考突破这种局限的途径，而这种局限性由他的“体系”的内在逻辑呈现出来，并且在他对自身的回顾和检查中得到了深刻的内省。如果不至引起人们的误解的话，我想套用恩格斯的说法：总之，传统的鲁迅研究在王富仁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鲁迅研究的全部发展和它的局限；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或半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鲁迅的道路。当然这将是一个荆棘丛生的过程，它不仅仅需要研究者知识结构的更新，还需要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建立和自由思想的形成，它不仅仅需要文化背景、政治背景的充分自由与宽容，而且还需要不同学术观点的毫不含糊的论争，它不仅仅需要专家们的探幽抉微，还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献身于这个历史辉煌又充满忧伤与痛苦的事业。

一切都翻了个个，一切都刚刚重新开始安排，列宁如是说。

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一切皆流

鲁迅也有一句类似的名言：一切都是“中间物”。

“中间物”的思想动摇了一切权威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和先定原则的基础，从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思维大厦摇摇欲坠。“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⑫

一九八六年以来，特别是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以来，鲁迅研究的内部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研究的目光越来越趋近于作为个体的鲁迅，从而鲁迅的复杂的意识冲突，文化心理结构的悖论特征及其在思维方式和艺术过程中的体现得到更多的关注，这种研究从根本上动摇了“至圣先师”的苍白形象，对于建立作为现实人的鲁迅形象有着重要意义。第二，把鲁迅与中外文化的联系置于重要位置，打破了以中国现实政治为唯一参照系的研究模式，人们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理论视野观照鲁迅，形成了富有研究者个性的鲁迅形象。第三，由于人们是从现实的政治冲突、文化冲突、经济冲突的焦点之中理解鲁迅精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神，鲁迅事实上已日益成为一种生活的批判性力量，鲁迅精神的现实性理解正在建立起来。由于时间贴得太近，也由于文章的篇幅有限，我无法展开对近期鲁迅研究的批判。我只想指出：一，由于研究者知识上的限制和方法上的陈旧，大量的论文缺乏细致的实证分析和理性思辨，尤其是关于文化问题的一系列命题显得空泛、抽象；二，由于研究者的现实感和批判精神对于研究过程的过渡渗透，研究的批判性往往掩盖了深度的不足，例如，对鲁迅的文化批判的研究却往往没有深入地思考鲁迅与传统文化的极其深微曲折的联系。三，新的理论体系和概念系统常常是在未加科学界定的情况下即进入研究过程，从而形成了一些新的似是而非的先定判断和先验概念。四，一些研究者在宣称人格平等的同时，还没有以此为前提，建立起对于鲁迅的独立的批判眼光……

然而，鲁迅研究终究寂寞而宁静，它那辉煌的过去也许只能属于过去。它不再引起轰动，不再显赫一时。除了鲁迅研究的不成熟之外，这是否还意味着别的什么呢？当权威的解释体系瓦解之后，人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层面、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出发探讨鲁迅，相互之间的歧异已经不再涉及对那种永恒的、神圣的、一统的观念体系的原则性态度，那么这种来自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轰动也必将销声匿迹。

我喜欢样这的寂寞与宁静。

然而我又憎恶那种没有辩驳，没有批评的寂寞与宁静。如果我们不再相互迁就以维持和谐，而是任性率真，在相互的歧异中体现各自的个性，那么我们就真正地向过去告别了。对我们来说，对历史的批判就是对自我的批判，因为我们不仅属于现在和未来，而且属于过去——那个漫长的、甚至未曾身历的过去！例如我自己，一面是站立在变迁的文化原野中来观察和审视那座古老而庄严的鲁学古堡，另一面又不免从那古堡的窗孔中忐忑不安地理解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原野的混乱、无序和变化，批判的激情与忡忡之忧心缠绕着我的魂灵。

1988年8月4日于北京

作者附记：本文在蕴酿和撰写过程中曾和吴予敏同志多次讨论，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

① 梅益：《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词》，见《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②③ 毛泽东：《论鲁迅》，见《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④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3—14页。应当说明，冯雪峰在《论〈野草〉》中对此问题的分析稍有变化，但他仍然是用"个人主义"和"进化论思想"的局限来解释鲁迅对"黄金世界"、"绝望"与"希望"的态度。这篇文章始终贯穿的"积极—消极"、"悲观—乐观"的二分法是鲁迅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分析模式，而划分和评价的尺度显然是从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出发的。

⑤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见《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下)。

⑥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0页，参见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⑦ 《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第330页。

⑧ 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浙江文艺出版社，第2页。

⑨ 参见李培林：《科学的"思辩"与新的理性》，见《读书》1988，第六期。

⑩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是从这个角度结构全书，上述看法见该书导论。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第213—214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第465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编 后 记

读者收到这本刊物，已经是岁末。开拓性，当代性，学术性，是我们刊物的宗旨。在读者热情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一直奔这个方向努力。但面对读者的期望，我们总是感到有愧于心。明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建国四十周年，新时期文学也走过了十一、二年，人们自然要作些历史的回顾和反思，我们愿意抓住这个重要历史时机，在历史大潮和世界大潮中加强工作，编发稿件，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明年刊物有一个更新的面貌。

本期“行进中的沉思”栏发表了两篇文章。《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是就鲁迅研究范围内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反思，这一工作自然离不开对已有的学术成果进行估价，但并非全面总结，所以并不着重谈成绩，而是着重谈不足和局限。文中对过去以及目前研究中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二元理论、双重遗产：何其芳现象》一文，则是着力解剖作为理论家何其芳的矛盾，为我们反思建国以来文艺理论活动和发展、文艺工作者的历史命运又开辟了一种视角。

“论坛”栏中陈继会的文章对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文学应取怎样的态势和保有怎样的品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代文学在眼下是否进入“低谷期”，值得考虑。但是，是正常抑或不正常？当代文学是否存在迷失？在哪里迷失？陈世旭的文章认为，当前的文学最大的迷失是艺术真诚的迷失，社会历史精神的迷失和现实精神的迷失。这些都是很有意义、也很有意味的问题，值得作更深入的探讨。

本刊的“外国文艺理论评介”栏，意在开一小窗口，看看国外文学理论和评论的情况。我们过去发的文章，也力求有较新的材料，反映较新的动向，作些力所能及的评介。读者反映有些文章看不懂。这其中，原因很多。一方面，我们希望作者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联系我国实情作些对照和介绍。另外，某些外国理论家确实行文艰深晦涩。本期评介阿多尔诺文艺观点的文章，可能又是一篇难懂的文章。据说，阿多尔诺是有意为之，连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伴马尔库塞都说看不懂他的某些文章。当然，我们不能因此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我们希望作者们注意克服这个并不太好的趋向。

我们刊物明年在价格、封面印刷等方面将作些变动。我们一直本着学术交流的精神，在定价上尽可能偏低一些，这点读者是清楚的。明年不得已要提价，我们也尽量控制，减少订购者的负担。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